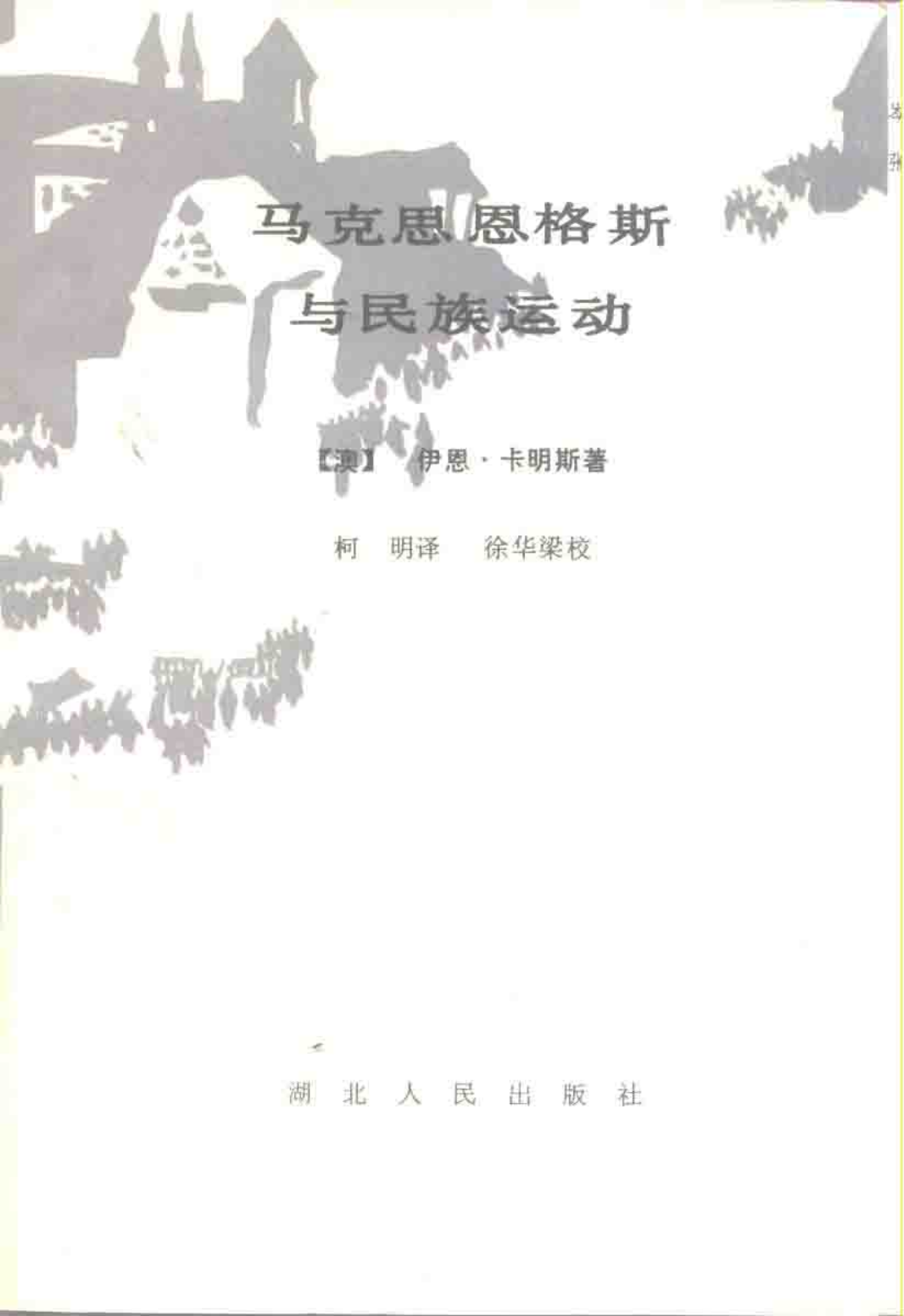


Marx, Engels and National Movements

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



【澳】 伊恩·卡明斯著



马克思恩格斯 与民族运动

【澳】 伊恩·卡明斯著

柯 明译 徐华梁校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限 表

1983年10月

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

〔澳大利亚〕伊思·卡明斯著

柯 明译 徐 华 梁校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7.75印张 2插页 180,000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00

统一书号：3106·661 定价：1.00元

D063

1

248810

出版说明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四日，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本社特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这本书，供我国学术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的参考。

本书于一九八〇年由克鲁姆·赫尔姆出版社在英国伦敦出版。

本书作者是澳大利亚墨尔本莫纳希大学的历史学讲师伊恩·卡明斯。

本书的英文版本对本书的简单介绍如下：

马克思恩格斯在尽力探讨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西欧进步的社会是最容易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地方。在这同时，他们也决没有忽略这个地区以外的那些地方的发展。确实，由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国际政治面貌，加上他们认定资本主义是普遍的制度这样的观念，他们深信，在那些较为不发达的地区，那些努力争取改变现状的力量，甚至能够影响西欧本身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

这本书探索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那个时代主要的民族运动的态度以及他们同这些民族运动之间的关系。本书论述了他们对于各个不同地区，如爱尔兰

兰，印度，波兰，中国，俄国，美国，以及其它许多地区(民族)运动的反应。所涉及到的时期，基本上是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直到十九世纪末，虽然，也间或提到了自从那时以来的发展情况。

马克思恩格斯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论述，有的是发表在他们的报刊上，间或也发表在他们的演说中，还有的则见之于他们私人的通信中——这些资料来源，并未被他们的那些直接继承人所得，甚至有的还不知道这些材料的存在。后来，这些分散材料的出版，有助于描绘出他们对民族问题在思想上比较连贯的画图。马克思恩格斯相信，民族的愿望与要求，和社会主义事业并不总是相一致的。对于每一个民族的斗争，必须考察其真相，并评判其是阻碍还是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

本书根据广泛的材料来源，探讨研究了迄今被忽略了的但却非常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与活动，并简略说明了在不同的时期，决定他们对待四大洲的各种各样的民族运动的态度的一些准绳。

本书作者广泛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民族运动的大量论述，参阅了许多学者的论著，运用了丰富的材料，阐述了他自己的研究结果。对于书中的材料和作者的观点，我们要独立思考，具体分析，不可囫圇吞枣。

本书由柯明译，并由徐华梁校阅。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四日

译者的话

本书系根据英国克鲁姆·赫尔姆出版社1980年英文版译出。本书的作者伊恩·卡明斯是澳大利亚莫纳希大学历史学讲师。全书由一篇序言和七章正文组成。作者按时间的顺序和问题的归类这两条线索，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的时期内，对当时涌现出的不同的民族运动的看法和态度。本书比较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和民族运动，关于民族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对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文章的引文，凡能找到中文版的，尽可能都注明中文版的出处；如无中文版的，则按作者的原注释注明出处。有的引文，特别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的引文，与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相应译文相对照，有较大出入。为了忠实于原文，我们均按英文引文译出，同时也注明参见中文版的出处，并在注释中对有些不同之处加以说明。书中提到的有的典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我们也加了注释。

张佩航同志曾对译文提出过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一九八三年二月，北京

目 录

序 言	1
致 谢	5
一、从西方的观点来看马克思恩格斯 关于革命变革的一般理论	7
二、1848年革命的影响.....	30
三、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 代所写的著作中的非欧洲世界.....	60
四、第一国际时期的发展	106
五、爱尔兰与第一国际的后期	133
六、俄国问题	157
七、结论：妙在丰富多彩	226

序 言

近年来，由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发展特别快的新行业，在一些著作家中，愿意在日益增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有所贡献的人都指出他们写书的原因何在，这已经成了一种大家都遵循的习惯。因此，本书自然也是要遵循这一习惯的。

在我最初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与民族问题有关的一些著作时，碰到过的引起争论的问题之一是：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习惯于在著作中用“历史的嘲弄”这个词，但实际上，这种历史的嘲弄现在已经落到了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活动上了。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那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取得了政权，并宣称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获得政治上和思想上启示的国家，根据这两位革命家提出的标准来看，它们是在比较“落后”和缺乏社会主义前提的社会里搞社会主义的。但是，我认为，过多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变革问题上基本上是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和后来的那些革命这一事实之间作比较，这是一种不明智的作法，尽管这些发生在工业化和和无产阶级化的西方之外的地区里的革命，都自称它们忠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导。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试图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动方式作出解释，从而导致他们得出这个结论时，即西欧发达的社会是最有可能进行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地区，他们也丝毫没有忽视这个地区以外的发展。当然，由于他们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结构，加上他们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正在普遍化的制度，因此，他们认为：在那些不发达的地区，某些对变革

会发生作用的力量，不仅对他们自己社会的内部，就是对他们的社会以外的地区都有一种影响力，甚至会影响到——不管是好是坏——西欧本身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马克思在世的日子里，不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存在着这样一些比较落后的社会，这些地区现在统称为“第三世界”（第三世界这个词掩盖了它们的差异和各自的特点），就是欧洲本身也存在着这样的社会，特别是在欧洲大陆的东部，以及在欧洲的最西部——爱尔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些地区（不论是欧洲范围内的，还是欧洲范围以外的）发生影响的一些运动的态度，正是本书将要研究的主要重点。除了在第一章中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变革的比较一般的理论时，涉及到他们对西欧的发展这个问题的一些论述外，再有就是在谈到世界上发达的地区和落后的地区互相影响时才提到西欧的发展问题。

以前的一些著作家，诸如希劳姆·阿维纳里，所罗门·布卢姆，埃莱那·卡雷尔·邓考斯，霍勒斯·戴维斯，以及爱尔兰的尼古拉斯·曼塞等人，都对本书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作过考察，并在不同程度上有过论述，这些著作家的所有作品（都已列举在本书的书目中）大大有益于本书的研究。遗憾的是乔治·豪普特，米歇尔·洛伊，克劳迪·韦尔合写的一部新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运动：1848—1914》（巴黎，马伯乐书店，1974年），只是在本书实际上已经脱稿后才引起我的注意。然而，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有些是以数量较少的资料为根据的（例如曼塞的著作，以及在较程度上布卢姆的著作），并且在他们的著作问世之后，迄今为止又出现了好些资料。另外还有些著作，例如阿维纳里的著作，以及上述布卢姆的著作，它们所涉及的领域要比本书窄些，或者说它们主要限于马克思的论述，很少提到恩格斯。还有一些人，诸如埃莱那·卡雷尔·邓考斯，乔治·豪普特和他的合作者，以及

H·B·戴维斯，他们对许多理论家的思想和态度都作了考察，他们在这方面比本书花的篇幅多，因此，他们就不得不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作简略的论述。

尽管后一类著作家们把讨论的范围扩大了，把列宁、斯大林这些人都包括在内，但我还是把自己考虑问题的重点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思想上。正象本书将表明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民族运动的看法，通常反映在他们为报刊写的文章，以及演讲、通信和他们所写的关于其它问题的著作中顺便提到的一些评论中，并没有上升到一种普遍的理论的高度。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在本书的书名上，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词，而宁可用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的名字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从马克思自己的榜样中得到了启示。他曾经表示自己同他的那些狂热的法兰西的追随者们，以他的名字提出的某些思想没有关系，他曾一度宣称他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就民族问题而言，值得提一下的是，把“马克思主义”一词和民族问题联系起来使用的第一个有名望的作者，是过去第比利斯一所神学院的学生^①。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出版后只有三年，他就成为第一届苏维埃民族委员会的人民委员，被授权去建立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作为新的正统。不过，他的思想和活动，和那些属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一样，不在本书研究的范围之内。

为了使想查阅本书中涉及到的一些资料的读者方便起见，我所引用的一些资料都尽可能地选自比较容易找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现成译本。有一些则是我自己翻译的。

在第六章中，日期采用的是公历，这和西方的习惯一致。但

① 按指斯大林。该文献载《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2卷。——译注

是，来自俄国的一些文献和信件，采用的是儒略历^①和公历两种，以儒略历为先。来自日内瓦或伦敦这些俄国侨民集中的地区的文献，只按照公历记载日期。在十九世纪，儒略历比公历晚十二天，到二十世纪就晚了十三天。

^① 按指凯撒制定的历法。——译注

致 谢

在此，我谨向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给我帮助的所有人致谢。

我的朋友和同事，莫纳希大学教授艾伦·麦克布莱阿对我的帮助最大。作为把“必然的循序渐进”这个词用来描绘一个运动的著名历史学家，他很可能会感觉到本书的特有形式是循序渐进。他的宝贵的支持和鼓励，对本书的最终完成起了保证作用。

同样，在本书的写作准备过程中，特鲁布大学的J·S·格雷戈里教授和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的伊斯列·盖茨莱尔教授的明智的忠告，对本书都是大有裨益的。我还要感谢莫纳希大学的乔治·凯尔泰茨先生，他在本书的某些方面给了我可贵的帮助。

我和许许多多的学者们一样，他们当中至少包括本书的中心人物之一^①，都对英国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表示谢意，该图书馆现已重新命名^②，就是在这个图书馆里，本书若干篇章所研究的思想得以初步形成。向我提供帮助的还有莫纳希大学图书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伦敦大学图书馆、墨尔本大学图书馆，以及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谨向它们一一致

① 按指马克思。——编注

② 这个图书馆，马克思在世时，是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或叫英国博物馆阅览室。现在，这个图书馆已与中央图书馆合并，成为英国图书馆参阅部的一部分。——编注

谢。

我必须感谢贝斯·布鲁德内尔夫人和本书刚开始写作时的奥德丽·艾伦夫人，因为她们在本书原稿的打印中，是极其认真、耐心细致的。我还要向瓦尔·伊登斯，朱莉·哈迪，科里·路德维格等人表示谢意，感谢他们大力帮助上述两位夫人的卓越的工作。

纵然对我有这么多的帮助，本书所存在的任何缺点都完全要由我个人负责。

就我个人家庭方面说来，怎么感谢我所爱的家中成员莉莉、达缅恩和娜塔莎都是不够的，因为她们在本书写作的全过程中给我以全力支持和鼓励。所以马克思的泄气话“那些没有家室之累的人真是福气呵！”对我来说是不适用的。

一、从西方的观点来看马克思恩格斯 关于革命变革的一般理论

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一段值得人们注意的话，他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这个论点不仅适合于马克思所说的那些人，就是对马克思本人来说也是极其适用的，并且，对以后的世代来说，这个论点也丝毫没有失去它的效力。那些自称是马克思的信徒的男男女女们，当轮到他们（她）们来谋求“创造”俄国1917年以来的历史时，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个论点。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俄国继承人——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发现：他们“创造”历史的自由总是要受到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的限制，他们自己写的历史，其本身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当时的条件的影响。本书的很大一部分所要涉及到的正是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至少是影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活动的一个方面。

一个相对来说是近代的、稳步发展的现象是民族意识的存在和传播，这个现象贯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时间的历史阶段，不但是在欧洲，就是在欧洲范围之外亦是如此。正象《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宣布的那样，“工人没有祖国”^②，欧洲经历了著名的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人民全盛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们在寻求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历史的时候，认为阶级斗争的最终影响要比那种较为短暂的民族范围斗争的影响大得多，他们还是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到那时发生的民族斗争上去，不仅在他们四分五裂的祖国，就是在诸如意大利、爱尔兰和东欧等地也有这样的民族斗争。但是，无产阶级（当时只是在西欧经济较发达的一些地区才有）的利益，并不总是同那些为争取承认他们的民族而进行斗争的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由于当时欧洲政治形势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一些人都认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却显然是对立的。因此，虽然他们同情某些民族运动，但是如果其它的那些民族运动当时会象后来他们的一个信徒所说的那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被人们遗忘——这一说法已流传下来，成为不朽的名言——的话，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本来是会感到十分高兴的。

如果马克思象他的朋友和合作者恩格斯说的那样，“首先是一个革命家”^①，那么，他的革命活动就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中进行的。因此，要使这些革命活动有可能获得成功，就必须从建立在充分考虑到当时存在的世界特点的战略出发。为了变革世界，首先要认识世界。然而，由于在马克思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认识和变革世界的努力所采取的形式是努力发现“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②，而这个规律并没象他所预期的那样起作用，这就导致他把较多的注意力放在那些根据他的标准来看是比较落后的社会上。在马克思在世的日子，被认

①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页，1972年。

为是这样的社会不仅遍及亚洲和非洲广大地区，就是在欧洲，除了集中在欧洲大陆西部的一些经济上发达的国家之外，本身也有这样的社会。虽然，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些地区所具有的发展，离开独立地进入社会主义还远得很，但在马克思看来，这些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在“变革世界”中正在发挥它们的作用。本书下面涉及到的要讨论的大部分，正是马克思对这样一些社会在这个变革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的评价。假如我们要想弄明确，马克思是否按照他的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来评价过——并且，如果评价的话，谈到什么程度——那些社会中发生的事件，或者在另一方面，是否他对那些社会的评价导致他改变或修正那些一般理论的话，那么，首先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那些理论的本身。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当人们回想起马克思研究过的德国的哲学、法国的社会主义和英国的经济学在这个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起过的作用，那么，显而易见，这个理论是起源于西欧的传统。如果联系到马克思毕生都关注革命这一点来考虑问题，那么，对马克思的一般理论的形成有过帮助的这三个因素的范围就使人们想起，对于马克思来说，革命是一种广泛的、彻底的现象，而不是“夺取政权”这个词所意味着的局限于纯政治方面的现象。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忽视过革命的政治方面。但是要使政治革命具有长久的、意义深远的特性，政治革命就必须结合广泛的社会革命一起进行。在马克思的妇产学的比喻中，既然社会革命是孕育着新的社会制度的母体，那么政治革命就必然是这一过程的高潮中的重大事件，一个常常需要助产婆，即暴力介入的事件。成熟了的马克思的看法：“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这意味着仅仅改变政权不足以给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社会以新的形式。不管人们是不是一定会接受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和他成熟以后的著作之间是有区别的这一事实^①，但是马克思对纯政治革命的局限性的认识至少构成了他整个一生中始终一贯坚持的一个思想。早在1844年他就写到：

“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为。而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推翻和破坏旧的东西。但是，只要它的组织活动在哪儿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和精神也就在哪儿显露出来，社会主义就在哪儿抛弃了政治的外壳。”^②

马克思并不需要超出自己祖国的国界就能看到纯政治革命的局限性。实际上，正象确信必须有“哲学之实现”的青年人所看到的，到他那时为止，德国的经历显然一直是令人沮丧的。马克思认为，产生这种可悲的局势的原因，至少部分地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德国革命基本上一直被限制在思想领域里，而不是表现在行动上。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德国人民生活的现实萌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子里生长起来的。”^③作为结果，马克思又说：

① 一直有人提出要作这样的区别，例如路易·阿尔蒂塞尔。参见他的《论马克思》第33—37页。该书出版于1965年，1969年企鹅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B·布鲁斯特译的英文版。

②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8—48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译文略有区别。此处根据作者的原著英文引文译出——译注）

③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